

梅洪吉 主编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顾问 马蹄疾



朱青阮小七



【明末清初】

金圣叹评

贯华堂第五

才子书水浒传

上册

出版社

水浒系列小说集成

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 
(上)

(明)施耐庵 著  
(清)金圣叹 评  
魏平 文博 校点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---

## 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

### 出版说明

在《水浒传》的各种版本中，最为流行的是金圣叹评点本。金圣叹评本共七十回，是以袁无涯刊本、芥子园本为底本，截取删节而成，并将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改写为“梁山泊英雄惊噩梦”，杜撰了一个“惊噩梦”的结局。书中有金圣叹的大量评语，他的评语，有许多独到的、精辟的见解，对一般读者富有启发和指导作用，同时也对农民起义进行了诋毁。这些，都成为后来许多续书的生发之处。为此，我们这套小说把这部作品收了进来，以便使读者能够看到各种续书之间的关系。

我们这次整理，以明崇祯年间贯华堂本为底本，保留了金圣叹的全部评语。

## 前 言

金圣叹是明末清初时著名的小说、戏曲评点家，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位贡献卓著的文艺理论大师。

金圣叹原名采，字若采。明亡入清之时，他效陶渊明晋亡入宋时的故例，改名人瑞，又名喟，字圣叹。他批点“才子书”也以圣叹署名，圣叹此名也等于成了他的笔名。自金批《水浒》、《西厢》问世至今，金圣叹这个鼎鼎大名凡爱好文学者几乎无人不知。

金圣叹自名喟，字圣叹，是自比圣人，俨然以当代孔子自居。廖燕《金圣叹先生传》和赵时辑《评选杜诗总识》都曾对他作过生动介绍。赵文还记录了金圣叹对自己名字的解释：“《论语》有两‘喟然叹曰’，在‘颜渊’则为叹圣，在‘与点’则为圣叹。”可见他为人的气魄之大。他的气魄之大并非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，他的确是个难得的志士和大才。他十一岁那年就博览群书，读过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和《水浒传》等书。当时的风气基本上还是独尊儒术，推行理学。他却于儒道佛之书，无所不窥；儒道佛诸学，无所不通。此其一。他在八股盛行、科举热门的时代，却无意仕进，专心批书著述，而且批的主要还是为世所轻的小说、戏曲等冷门货。此其二。他又愤时人以戏曲、小说为小道，而不知其乃天大文章，故特标举《水浒》和《西厢》与《庄子》、

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、杜诗同为“六才子书”。《水浒》因为圣叹的提倡和批改而得以家弦户诵。此其三。金圣叹身处山野江湖之远，而日有忧国忧民之心。他在诸“才子书”的批语中，讽刺明末陋政，抨击社会黑暗，同情劳苦人民以及追求美满婚姻的青年。其议论之大胆，识见之高远，环顾当世，罕有匹者。他最后为民请命，涉“哭庙案”而以身殉志，尤为难能可贵。

金圣叹作为一个大文学家，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不少名著独有会心，能发前人所未发或所不敢发。以金批杜诗来说，就很精彩。与我在复旦大学共事四十几年的老同事刘大杰，他在写作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时，就小说、戏曲部分听取过我的不少意见。如书中尽有“金圣叹”一节，也论及金批杜诗，我很表赞同。金圣叹的文笔活泼多姿，我的故友郑振铎五六十年前曾赞扬说：“犀利而能深入，纡曲而能尽情，如水云之波荡。”我也深表赞同。

金圣叹思想解放，见解深刻，才气横溢，文笔隽秀，于当时、后世影响很大。中国评点式的评论方法因为他而达到高峰，后世学习、模仿他的人很多。现在不少论者充分肯定他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崇高地位，我也深以为然。我对六十年代金兆梓的那篇论金批《水浒》、《西厢》文章中的不少观点也很为赞赏。当然，人无十全，金圣叹也是有缺点的。以他批点《西厢》来说，他仅能从文学角度来评论和修改，他不懂曲律，有时就难免隔靴搔痒或者出错。李渔很赞赏金批《西厢》，至谓金批一出“能令千古才人心死”，“作《西厢》者心死”，但他也批评圣叹所评，“乃文人把玩之《西厢》，非优人搬弄之《西厢》”，颇为中肯。另外，金圣叹认为《西厢》应到“草桥惊梦”为止，第五本是不知何人的狗尾续貂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。我认为第五本也是王实甫所作，且第五本中如红娘痛诋郑恒之处，也是好的，不是“狗尾”，有它存在的价值，不应删去。我以前是这个意见，并专门写过《〈西厢记〉作者问题辨正》一文（详见拙作《中国戏曲初考》），现在仍无改变。

金圣叹由于家贫，他的著述在生前刻印不多。他年仅五十三而不幸遇难，原有的写作计划中断，未能充分舒展他的天才，这是极可惜的。他逝世后，他的家属和亲友又因种种原因，未能及时出版他已完成的全部著作，故而他的诗歌创作和哲学论著散佚很多，这也是极可惜的。幸好他的文学论著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，只是三百年来印行极少，不少书连一些研究者也未能看到。十年浩劫之后，他的著作更不易见到了。现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在创办伊始即用较快的速度出版《金圣叹全集》，将金圣叹现存的全部文字汇集在一起，完整地提供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，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。

赵景深 甲子元旦

# 序 一

原夫书契之作，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其端肇于结绳，而其盛极而为六经。其乘简载笔者，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。在圣人之位，则有其权；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。有其权而知其故，则得作而作，亦不得不作而作也。

是故《易》者，导之使为善也；《礼》者，坊之不为恶也；《书》者，纵以尽天运之变；《诗》者，衡以会人情之通也。故《易》之为书，行也；《礼》之为书，止也；《书》之为书，可畏；《诗》之为书，可乐也。故曰《易》圆而《礼》方，《书》久而《诗》大。又曰《易》不赏而民劝，《礼》不怒而民避，《书》为庙外之几筵，《诗》为未朝之明堂也。若有《易》而可以无《书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书》也。有《易》有《书》而可以无《诗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诗》也。有《易》有《书》有《诗》而可以无《礼》也者，则不复为《礼》也。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；知其故，则知《易》与《书》与《诗》与《礼》各有其一故，而不可以或废也。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，则有其权；有其权，而后作《易》，之后又欲作《书》，又欲作《诗》，又欲作《礼》，咸得奋笔而遂为之，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。

无圣人之位，则无其权；无其权，而不免有作，此仲尼是也。仲尼无圣人之位，而有圣人之德；有圣人之德，则知其故；知其故，而不能

已于作，此《春秋》是也。

顾仲尼必曰：“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”斯其故何哉？知我惟《春秋》者，《春秋》一书，以天自处学《易》以事系日学《书》，罗列与国学《诗》，扬善禁恶学《礼》：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，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，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，以合为一书，则是未尝作者也。夫未尝作，仲尼之志也。罪我惟《春秋》者，古者非天子不考文，自仲尼以庶人作《春秋》，而后世巧言之徒，无不纷纷以作。纷纷以作既久，庞言无所不有；君读之而旁皇于上，民读之而惑乱于下，势必至于拉杂燔烧，祸连六经。夫仲尼非不知者，而终不已于作，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。

或问曰：然则仲尼真有罪乎？答曰：仲尼无罪也。仲尼心知其故，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，于是因史成经，不别立文，而但于首大书“春王正月”。若曰：其旧则诸侯之书也，其新则天子书也。取诸侯之书，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，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。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，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！

是故作书，圣人之事也。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也。作书，圣人而天子之事也。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也。何也？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书破道，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书破治。破道与治，是横议也。横议，则乌得不烧？横议之人，则乌得不诛？故秦人烧书之举，非直始皇之志，亦仲尼之志。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，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，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。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，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；实无其德，则不知其故；不知其故，斯尽烧矣。故并烧圣经者，始皇之罪也；烧书，始皇之功也。

无何汉兴，又大求遗书。当时在廷诸臣，以献书进者多有。于是四方功名之士，无人不言有书，一时得书之多，反更多于未烧之日。今夫自古至今，人则知烧书为祸至烈，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！烧书，而天下无书；天下无书，圣人之书所以存也。求书，而天下有书；天



下有书，圣人之书所以亡也。烧书，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。求书，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。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，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。明圣人之教者，其书有之；叛圣人之教者，其书亦有之。申天子之令者，其书有之；犯天子之令者，其书亦有之。

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，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，犹在所不许。何则？恶其破道与治，黔首不得安也。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，犯天子之令，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？原其由来，实惟上有好者，下必尤甚。父子兄弟，聚族撰著，经营既久，才思溢矣。夫应诏固须美言，自娱何所不可？刻画魑魅，诋讪圣贤，笔墨既酣，胡可忍也？是故，乱民必诛，而“游侠”立传；市侩辱人，而“货殖”名篇。意在穷奇极变，皇惜刳心呕血，所谓上薄苍天，下彻黄泉，不尽不快，不快不止也。如是者，当其初时，犹尚私之于下，彼此传观而已，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。殆其既久，而上亦稍稍见之，稍稍见之而不免喜之，不惟不之禁也。夫叛教犯令之书，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，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憚乎哉！其作者，惊相告也；其读者，惊相告也。惊告之后，转相祖述，而无有一人不作，无有一人不读也。

于是而圣人之遗经，一二篇而已；诸家之书，坏牛折轴不能载，连阁复室不能度也。天子之教诏，土苴之而已；诸家之书，非缥緜不为其题，非金玉不为其签也。积渐至于今日，祸且不可复言。民不知偷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；民不知淫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；民不知诈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；民不知乱，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。

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，其书破道，非天子而作书，其书破治者，不过忧其附会经义，示民以杂；测量治术，示民以明。示民以杂，民则难信；示民以明，民则难治。故遂断之破道与治，是为横议，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耳。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，极害于王治也，而然且如此。若夫今日之书，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，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？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事，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。而祸首

罪魁，则汉人诏求遗书，实开之衅。故曰烧书祸烈，求书之祸尤烈也。烧书之祸，祸在并烧圣经。圣经烧，而民不兴于善，是始皇之罪，万世不得而原之也。求书之祸，祸在并行私书。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不有，此汉人之罪，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。然烧圣经，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，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。若行私书，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，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。呜呼！君子之至于斯也，听之则不可，禁之则不能，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？

曰：吾闻之，圣人之作书也以德，古人之作书也以才。知圣人之作书以德，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，读者贵乎神而明之，而不得栉比字句，以为从事于经学也。知古人之作书以才，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，览者急须褫裳去之，而不得拮据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。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《易》之下作《易》传，《书》之下作《书》传，《诗》之下作《诗》传，《礼》之下作《礼》传，《春秋》之下作《春秋》传也。何也？诚愧其德之不合，而惧章句之未安，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。于诸家之书而诚能褫裳去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《庄》之后作广《庄》，《骚》之后作续《骚》，《史》之后作后《史》，《诗》之后作拟《诗》，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。何也？诚耻其才之不逮，而徒唾沫之相袭，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。

夫扬汤而不得冷，则不如且莫进薪；避影而影愈多，则不如教之勿趋也。恶人作书，而示之以圣人之德，与夫古人之才者，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，现于才之林者难为文，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。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；非夫人之能事，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能敢及也。彼古人之才，或犹夫人之能事；犹夫人之能事，则庶几乎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。夫古人之才也者，世不相延，人不相及。庄周有庄周之才，屈平有屈平之才，马迁有马迁之才，杜甫有杜甫之才，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，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。

才之为言材也。凌云蔽日之姿，其初本于破核分荚。至破核分荚

之时，具有凌云蔽日之势；于凌云蔽日之时，不出破核分荚之势，此所谓材之说也。又才之为言裁也。有全锦在手，无全锦在目；无全衣在目，有全衣在心；见其领，知其袖；见其襟，知其帔也。夫领则非袖，而襟则非帔，然左右相就，前后相合，虽然各异，而宛然共成者，此所谓裁之说也。

今天下之人，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。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。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。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。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。言有才始能构思、立局、琢句而安字者，此其人，外未尝矜式於珠玉，内未尝经营於惨淡，隋然放笔，自以为是，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，正是无法於手而又无耻於心之事也。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、构思以后，乃至绕乎布局、琢句、安字以前以后者，此其人，笔有左右，墨有正反；用左笔不安换右笔，用右笔不安换左笔；用正墨不现换反墨；用反墨不现换正墨。心之所至，手亦至焉，心之所不至，手亦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者。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圣境也。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，文章之神境也。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，文章之化境也。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，则是其纸上无字、无句、无局、无思者也。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，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，乃摇摇有局，乃铿铿有句，而烨烨有字，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，才以绕其前，才以绕其后，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。

故依世人之所谓才，则是文成于易者，才子也；依古人之所谓才，则必文成于难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于易之说，则是迅疾挥扫，神气飞扬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于难之说，则必心绝气尽，面犹死人者，才子也。故若庄周、屈平、马迁、杜甫，以及施耐庵、董解元之书，是皆所谓心绝气尽，面犹死人，然后其才前后缭绕，得成一书者也。庄周、屈平、马迁、杜甫，其妙如彼，不复具论。若夫施耐庵之书，而亦必至于心绝气绝，

面犹死人，而后其才前后缭绕，始得成书，夫而后知古人作书，真非苟且也者。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，废然歇笔，然则其人真不足诛，其书真不足烧也。

夫身为庶人，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，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，条分而节解之，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，已作之书一旦尽废，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，为更奇于秦人之火。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。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，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。

## 序 二

观物者审名，论人者辨志。施耐庵传宋江，而题其书曰《水浒》，恶之至，逆之至，不与同中国也。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，乃谬加以“忠义”之目。呜呼！忠义而在《水浒》乎哉？忠者，事上之盛节也；义者，使下之大经也。忠以事其上，义以使其下，斯宰相之材也。忠者，与人之大道也；义者，处己之善物也。忠以与乎人，义以处乎己，则圣贤之徒也。若夫耐庵所云“水浒”也者，王土之滨则有水，又在水外则曰浒，远之也。远之也者，天下之凶物，天下之所共击也；天下之恶物，天下之所共弃也。若使忠义而在水浒，忠义为天下之凶物、恶物乎哉！且水浒有忠义，国家无忠义耶？夫君则犹是君也，臣则犹是臣也，夫何至于国无忠义？此虽恶其臣之辞，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。父则犹是父也，子则犹是子也，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？此虽恶其子之辞，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。故夫以忠义予《水浒》者，斯人必有憖其君父之心，不可以不察也。

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，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？其幼，皆豺狼虎豹之姿也；其壮，皆杀人夺货之行也；其后，皆敲朴剜割之余也；其卒，皆揭街斩木之贼也。有王者作，比而诛之，则千人亦快，万人亦快者也。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钺？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

宋朝者，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，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？耐庵有忧之，于是奋笔作传，题曰《水浒》，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，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，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，君子之志也。而又妄以忠义予之，是则将戒者而反将为劝耶？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，杀人夺货而有伯夷、颜渊之誉，剜剔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，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，既已名实抵牾，是非乖错，至于如此之极，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，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，以为高山景行，其心响往者哉！

是故由耐庵之《水浒》言之，则如史氏之有《樗枳》是也，各书其外之权诈，各书其内之凶恶，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，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。由今日之《忠义水浒》言之，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、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。无恶不归朝廷，无美不归绿林，己为盗者读之而自豪，未为盗者读之而盗也。呜呼！名者，物之表也；志者，人之表也。名之不辨，吾以疑其书也；志之不端，吾以疑其人也。削忠义而仍《水浒》者，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，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。虽在裨官，有当世之忧焉。后世之恭慎君子，苟能明吾之志，庶几不易吾言矣哉！

## 序 三

施耐庵《水浒》正传七十卷，又楔子一卷，原序一篇亦作一卷，共七十二卷。今与汝释弓。

序曰：吾年十岁，方入乡塾，随例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书，意悟如也。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：不知习此将何为者？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，其意乐甚，殊不知其何所得乐？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？其中皆何所言，不雷同耶？如是之事，总未能明于心。明年十一岁，身体时时有小病。病作，辄得告假出塾。吾既不好弄，大人又禁不许弄，仍以书为消息而已。吾最初得见者，是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次之，则见屈子《离骚》。次之，则见太史公《史记》。次之，则见俗本《水浒传》。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。《离骚》苦多生字，好之而不甚解，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。《法华经》、《史记》解处为多，然而胆未坚刚，终亦不能常读。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，吾于《水浒传》可谓无间然矣。

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，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，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，此皆大错。夫儿子十岁，神智生矣，不纵其读一切书，且有他好，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，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。汝昔五岁时，吾即容汝出坐一隅，今年始十岁，便以此书相授者，非过有所宠

爱，或者教法之道当如是也。吾犹自记十一岁读《水浒》后，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。吾实何曾得见一书，心知其然，则有之耳。然就今思之，诚不谬矣。天下之文章，无有出《水浒》右者；天下之格物君子，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。学者诚能澄怀格物，发皇文章，岂不一代文物之林？然但能善读《水浒》而已，为其人绰绰有余也。

《水浒》所叙，叙一百八人，人有其性情，人有其气质，人有其形状，人有其声口。夫以一手而画数面，则将有关兄弟之形；一口而吹数声，斯不免再映也。施耐庵以一心所运，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，无他，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，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，固不以为难也。格物亦有法，汝应知之。格物之法，忠恕为门。何谓忠？天下因缘生法，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。天下自然，无法不忠。火亦忠，眼亦忠，故吾之见忠。钟忠，耳忠，故闻无不忠。吾即忠，则人亦忠，盗贼亦忠，犬鼠亦忠。盗贼犬鼠无不忠者，所谓恕也。夫然后物格，夫然后能尽人之性，而可以赞化育，参天地。今世之人，吾知之，是先不知因缘生法。不知因缘生法，则不知忠。不知忠，为知恕哉？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。谓其妻曰：眉犹眉也，目犹目也，鼻犹鼻，口犹口，而大儿非小儿，小儿非大儿者，何故？而不自知识与其妻亲造作之也。夫不知子，问之妻。夫妻因缘，是生其子。天下之忠，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；天下之忠，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。审知其理，而睹天下人之面，察天下夫妻之事，彼方面不同，岂不甚宜哉！忠恕，量万物之斗斛也。因缘生法，裁世界之刀尺也。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，右手持如是刀尺，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、气质、形状、声口者，是犹小试其端也。若其文章，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章法，部有部法，又何异哉！

吾既喜读《水浒》，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，吾日夜手抄，谬自评释，历四五六七八月，而其事方竣，即今此本是已。如此者，非吾有读《水浒》之法，若《水浒》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矣。吾旧闻有人言：庄生之文放浪，《史记》之文雄奇。始亦以之为然，至是忽啞然其笑。古



今之人，以聾语聾，真可谓一无所知，徒令小儿肠痛耳！夫庄生之文，何尝放浪？《史记》之文，何尝雄奇？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，而徒见其忽言化鱼，忽言解牛，寻之不得其端，则以为放浪。徒见《史记》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，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、捐金重义为多，则以为雄奇也。若诚以吾读《水浒》之法读之，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，《史记》之文亦精严。盖天下之书，诚欲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人，即无有不精严者。何谓之精严？字有字法，句有句法，章有间法，部有部法是也。夫以庄生之文杂之《史记》不似《史记》，以《史记》之文杂之庄生，不似庄生者，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，《史记》摭其怨愤而已。其志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有固然者，毋足怪也。若复置其中之所论，而直取其文心，则惟庄生能作《史记》，惟子长能作《庄子》。吾恶乎知之？吾读《水浒》而知之矣。

夫文章小道，必有可观，吾党斐然，尚须裁夺。古来至圣大贤，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。只如《论语》一书，岂非仲尼之微言，洁净之篇章？然而善论道者论道，善论文者论文，吾尝观其制作，又何其甚妙也！《学而》一章，三唱“不亦”；叹“觚”之篇，有四“觚”字，余者一“不”、两“哉”而已。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”，其文交互而成。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，其法传接而出。“山”“水”“动”“静”“乐”“寿”，譬禁树之对生。“子路问闻斯行”，如晨鼓之频发。其他不可悉数，约略皆佳构也。彼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，各以其书独步万年，万年之人，莫不叹其何处得来。若自吾观之，彼亦岂能有其多才者乎？皆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者也。《水浒》所叙，叙一百八人，其人不出绿林，其事不出劫杀，失教丧心，诚不可训。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，伸其神理者，盖此书七十回、数十万言，可谓多矣，而举其神理，正如《论语》之一节两节，浏然以清，湛然以明，轩然以轻，濯然以新，彼岂非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之流哉！不然，何以有此？如必欲苛其形遗迹，则夫十五《国风》，淫污居半；《春秋》所书，截夺十九。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，憎《樛机》而诛倚相，此理至明，亦易晓矣。